

新闻业务学习资料

杂文、短论选

文汇报编辑部编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长短相较”说	繁星 (1)
药也会变么?	繁星 (4)
“三户”颂	唐 弢 (6)
怕·敬·爱	余心言 (10)
辩论“穷棒子过年”	繁星 (13)
况钟的笔	巴 人 (16)
“废名论”存疑	任 海 (19)
“积重难返”	唐 弢 (20)
画蛋	于 厘 (24)
门外汉手记	唐 弢 (27)
名与实之间	王若水 (32)
自由和必然	鲁 德 (40)
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	白 水 (42)
偶感二则	陈残云 (44)
松树的风格	陶 铸 (46)
论“土包子住洋楼”	吴 滤 (49)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52)

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宋振庭 (56)
桌子的哲学——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对话	若 水 (59)
杂谈出笼	陈虞孙 (66)
“放下即实地”	马南邨 (68)
林白水之死	马南邨 (71)
下雨趣闻	马南邨 (74)
黄钟与瓦釜	郭沫若 (77)
关于熊猫	周建人 (79)
“言论老生”	唐 弢 (81)
“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骆 漠 (83)
“差不多”——“一部分”	谢觉哉 (86)
螃蟹与其他	尚 弓 (88)
人和鬼	吴 晗 (92)
试论革命风格	马铁丁 (95)
从借书谈起	邓 拓 (111)
维妙维肖的自画像	解放军某部批判组 (113)
“还我头来!”	陈虞孙 (119)
唯真知出大勇	宋振庭 (122)

“长短相较”说

繁 星

人民日报副刊择定五月四日，开辟一小块篇幅作专栏，名之曰《长短录》。

四十三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个文化革新运动，但它的结果，却使我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这个变化，使中国革命的面貌起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人民开始学习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它来作为观察客观世界，观察国家与革命的工具。一经学习这个无价的法宝，就立刻使中国的革命踏上胜利的道路，东方的天空从此破晓。

但是学习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曲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学习它很不容易。不要说五四运动的当时，即使是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先进分子，都还有不少人没有学好；就是到现在，学习的人更多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学好。

是什么东西，在障碍我们学好和运用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对五四运动作了极其公正的评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

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

这个“消极因素”不仅为患于五四运动的当时，直到现在，它的遗祸也还没有完全除尽。形式主义地、主观主义地、片面地、绝对化地看问题的方法，是害死人的。就是它，至今还盘旋在我们的头脑中，阻挠着我们去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我们的头脑中，经常有两种世界观在打架；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我们热情而虔诚地学习着它；另一种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绝对主义的世界观。

毛泽东同志多次引用过老子在二千多年前说过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事物的“二重性”，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使我们想起老子说过的另一段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不管老子是个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他这段话是包含了辩证法的，是合乎“对立统一规律”的。相生、相成、相较、相倾、相和、相随，正是说明矛盾的双方，对立而又统一，缺一面就都不存在；一切皆美，就无所谓美了，一切皆

善，就无所谓善了。

天下没有绝对相同的事物。但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差异，只有在两者相比较、相矛盾时，才能加以区别。所以老子说：“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分析和比较，这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方法。这个专栏名之曰《长短录》，就有“长短相较”的意思。同时，也还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意思。取长补短，那就不但是作者自己，而且要请读者群众来帮助作者，以大家之长，来补作者之所短。

1962年5月4日《人民日报》

（选自繁星：《分阴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北京出版社版）

药 也 会 变 么？

繁 星

同几位大夫谈到治病用药，很有心得。

据大夫们说：现在有的病人要求高了，不管大病小病、伤风咳嗽，一来就要求大夫用“潘金链”给他治病。

潘金莲能治病，这不是讲笑话么？

大夫们笑着给我解释：这可不是《水浒》中武大郎的妻子、武松的嫂嫂潘金莲。这是我们给病人治病的三种药——潘尼西林、金霉素和链霉素。现在的病人动不动就要求用这几种药；不用，他不满意。

病人要求用有效的药物给他治病，岂不是合理的？这不正是说明我们的医疗条件提高了，病人的医药知识也提高了么？

几位大夫不觉掩口而笑。他们说：能有这几种“抗菌素”治病，说明我们的医疗条件提高了。倒是实在的。可是如果象这样滥用下去，医疗的效果不但不会提高，而且要大大降低，最后要使这几种“抗菌素”完全丧失作用，甚至还会引起正相反的效果。

这几位大夫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药也会变么？有效的良药，为什么会变成无效的呢？

大夫们把细菌和细菌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详详细细地演说一番，才使我顿开茅塞，若有所悟。

我没有学过医学、生物学、化学或药物学，这是生平的

一大遗憾。但是听了大夫们的话，却也大有所得。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一八五九年）时，早就告诉过我们，一切生物（动植物）是进化的；一切生物都能适应客观环境发生变异，即所谓“自然选择”的物种发展规律。列宁曾经称赞他是科学上的伟大革新者，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但是我们却还有不少的人不懂得这个观点。病菌是微生物，抗菌素“潘金链”也是微生物的代谢体。微生物同微生物之间，不但有对立的关系，也有统一的关系；还有从互相对立斗争转化为统一、共生的关系。抗菌素对某些危害人身的病菌，一个时候，是有抑制和杀死它们的作用的。但是经过若干次的斗争之后，在另一时候，病菌会改变自己来适应这种对立物，使抗菌素失去作用。据大夫们说：有一种噬菌体本来是以吃细菌为生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细菌却能发生抵抗噬菌体的能力。当然，这种变化并没有完结，还可能另有变化。总而言之，任何一种生物都不是永久不变的；抗菌素的作用不是绝对不变，被它所抑制或杀灭的病菌也不是绝对不变。抗菌素的杀菌作用只是相对的、有限的，把它看作永久绝对有效的药物，那就错了。

大夫们的这一席话，使我想起毛主席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可见即使是治病用药，也该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

1962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选自繁星：《分阴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北京出版社版）

“三 户” 颂

唐 弢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是秦始皇灭楚以后，楚国南方的一个老人说的，这个老人叫做楚南公，他认为楚国虽被消灭，即使最后只剩下“三户”人家，将来亡秦的一定还是楚人。这话后来居然成为事实。秦朝到了二世的时候，农民纷纷起义，首先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是楚人；继起的项梁、项羽，是楚人；最后得了天下的刘邦，也还是楚人。楚人是当时农民革命大风暴的中心。

为什么楚南公能有这样的预见呢？这是因为：他正确地估计了客观形势的发展，深刻地了解到楚国人民反抗嬴秦的决心，这个决心是符合于全体被压迫农民的要求的。因此，楚南公敢于肯定地说，即使最后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仍然会发挥力量，推翻嬴秦的统治。

“三户”的数目也许太小了，然而却代表着历史的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新的“三户”的故事。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说“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11页）这个社在安平县南王庄，“三户”

贫农是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他们不但保存了社的组织，而且一九五五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比一般农民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他们办合作社的决心，终于成为南王庄全体农民的榜样，目前这个社已经发展到二百八十户。

所以毛主席又说：“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同上）

“三户”诚然是一个小数目，其所以能够发挥力量，还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历史的正确的方向。

这便是问题的关键。

具体说来，“楚虽三户”的“三户”，是一个假定的数字，出现在南王庄的“三户”，却是实实在在的三家贫农；楚人掌握了当时被压迫农民要求革命的迫切的愿望，王玉坤他们掌握了什么呢？他们掌握的是一直伸展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历史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三户”贫农办社的决心里，透露了我们时代里奔腾汹涌、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我们的认识是非常不足的。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生长在民主革命时期，并且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一些反封建的斗争，两千年前农民对革命的要求，虽然离今天已经很远，却还是能够理解的，楚南公说的“三户”的意义，也就容易看得清楚。可是，表现在王玉坤等“三户”贫农身上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萌芽，却是一种新的东西，即使近在身边，反倒十分模糊，对他们坚决办社没有足够的估计。这种面临着新鲜事物而失去敏感，正是我们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不仅在农业合作化运

动里，萌长着王玉坤等“三户”贫农所表现的精神，每个部门，每个角落，早已存在着分散的、然而又是普遍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萌芽。可是，我们的某些同志只看到他们是“三户”，却没有去考察他们其实代表着整体的方向；只觉得“三户”在今天还是少数，却不知道明天就将成为多数；只是把一个个“三户”分散开来，孤立地去调查，却不是把所有的“三户”都联系起来，从全面进行规划。正因为这样，这些同志才振振有词地在那里“评头品足”，作“不适当的埋怨”，挂“无穷的忧虑”，捧出“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一段英勇斗争的历史，可惜没有想一想：当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自己却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

譬如吧：我们有这样的工厂，对工人创造发明一直抱着冷淡的态度，只准他们用废料，也不派工程师具体帮助，使新发明的机件质量提不高，厂长同志直“埋怨”：“三个臭皮匠，到底成不了大事！”我们也有这样的学校，对教师的工作从来不进行了解，不关心他们备课的情况，不调查他们向学生宣传些什么，校长先生一面叹气，一面“忧虑”：“为什么我们学校里不产生顾巧英？教师中有个顾巧英多好啊！”我们也还有这样的文艺团体，负责同志的抽屉里、案头上，塞足和堆满了青年的稿件，可是他忙着写论文；创作为什么不旺盛；做报告：文艺落后于客观现实。谁要是抬一指他的写字台，他自己也觉得猛吃一惊，连忙捧出“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会多，人手少，稿长，时间短！”等等，等等。

实在呢，什么也不短，不少。短的，少的，只是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

必须珍视生活中的新的萌芽，善于从平常人中间发掘社会主义的“三户”，不应该冷淡他，责备他，打击他。一切都不是凭空生长的。无论是两千年前楚人的“三户”也罢，

今天南王庄的王姓“三户”也罢，他们都寄托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着时代的新的力量，这才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

繁星丽天，让我们抬起头来吧！

迎接着社会主义的高潮，我于是作“三户”颂。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

（选自唐弢：《繁弦集》，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版）

怕 · 敬 · 爱

余心言

我们小的时候，看见先生，都是怀着几分恐惧的。那情形，有一点类似老鼠看见猫。先生，照例都是“严师”。“教不严，师之惰”。严的办法也很简单，戒尺一方，可以用来打手心，偶尔也打学生的头，确实很威风。等到大一些的时候，挨板子的机会少了，但对先生仍旧是怕的，因为先生的红笔底下掌握着批分数的生杀大权。至于批评先生贴先生的大字报，那更是根本谈不上了。虽然也读过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却没有、也不敢去联系一下实际。

师生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由来已经数千年，相沿成习，直到解放以后，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从封建社会的观点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是和“天地君亲”一起写在大红纸上让人们磕头顶礼的，先生怎么能和学生讲平等呢？学生必定不如先生，先生一定胜过学生；做学生的后来也成了先生，又一定胜过他的学生。总而言之，就象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有些人的主观愿望，它循着自己的规律走去，总是让做学生的胜过老师，“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旧社会里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只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育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告诉我们要不怕教授之后，才大大地打开了

我们的思路。这一年来，在学校里在党委领导下采用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办法，大搞群众运动，把敢想、敢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创造出的无数奇迹，更证明了学生不必害怕的道理。真理是无穷尽的，决非到了先生所知的地步就为止了。人都难免有缺点、错误，先生也不例外，决不是提不得意见，批评不得的。

学生不怕先生，是不是先生就应该反过来怕学生呢？也不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看到学生意气风发，在有些地方超过了先生，容易产生“后生可畏”的感觉。其实，“后生”可爱得很，有什么可畏呢？学生超过先生，说明学生学得好，也说明先生教得好。教得好，有自己一份功劳；学得好的是好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也是人生一乐吗？学生批评先生，也并没有什么可怕。批评有对有不对。对的，虚心接受，帮助了自己进步，正是教学相长，值得高兴；不对的，也可以以爱护的态度，指出之、教育之，帮助学生更好的进步。真正“可畏”的，并不是“后生”，而是自己的不虚心。错误舍不得丢掉，架子不愿意放下，听了两句批评就缩手缩脚，忘记了自己“为人师表”的职责所在了。

学生不怕先生，但还需要向先生学习，虚心地学习。“人非生而知之者”，知识都是学来的。“弟子不必不如师”，这是一面；学生在许多地方确实不如老师懂得多，这又是一面。学生可以超过先生，但又要先向先生学，学了才能超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要“出于蓝”，才能“胜于蓝”，这也是辩证的规律。先生应该虚心地听学生的意见，“不耻下问”，学生更应该虚心地听先生的教诲，“不耻上问”。先生的知识和意见未必都正确，所以应当准许学生批评先生。先生同学生比较起来毕竟知识要丰富些，这些知识虽然未必全对，但也未必全错，所以学生仍得向先生学习。

学了以后，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批评，可以同先生讨论。

学生和先生之间，各去掉一个怕字，换来了一个敬字，一个爱字。学生不怕先生，先生不畏后生，学生敬先生，先生爱学生。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待群众中的先生，应该有这种精神，对待学校里的先生何尝不要有这种精神。不怕不畏，亦敬亦爱，唯其希望后来者超过自己，所以更加爱护学生；学生虚心敬爱教师，教师虚心听意见并不断改造自己，更博得了学生的敬爱。而这些又都不妨碍互相的批评、帮助。我们可以预计，在这个新的年头里，师生之间会有更进一步的结合，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会发展得更完善。

——选自《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

（选自《上海十年文学选集》：散文杂文选1949年—1959，一九六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辩论“穷棒子过年”

紫 星

写上“穷棒子过年”这五个字，自己脑子里立刻出现对立面，一个面姓“辩”，另一个面姓“论”；它们俩倒先辩论开了：

辩：穷棒子，谁是穷棒子？现在的工人、农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无论你对谁，难道还能称他为“穷棒子”？在旧社会，“穷棒子过年”，就是过不了年，“送信的腊八，要命的糖瓜”，才到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刚待起身上天，就要了穷棒子的命了，还过个什么年？我说：第一、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穷棒子”这种人了；第二、现在还有谁是过不了年的？你这样写，不是在造谣撒谎、不合实际吗？

论：你这位同志讲得不对。事情隔得并不远，就在十年以前，穷棒子不是到处都有？那些曾经是穷棒子、现在还活着的人，不是多得很多？如若不信，你到全国各地的城镇和农村去打听打听，看还有多少。难道他们都象刘介梅，忘了本吗？况且刘介梅一经人们提醒，就回过头来了。《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过去可并不是少数啊。

辩：可是那些曾经是穷棒子的人，现在再不是穷棒子了呀。解放十年出头，哪儿还有什么过不了年的穷棒子？你这是在讲历史，还提它干吗？

论：是啊，我正是要从历史讲起，“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辩：又是今，又是古，那么你倒说说看，今和古有什么不同的？

论：古就是解放以前，穷棒子过年，是一年不如一年。

辩：那谁不知道呢？

论：今，就是解放以后，穷棒子过年，一年比一年好。

辩：你这又是在讲废话。谁不知道穷棒子——现在根本不是穷棒子了——是一年比一年好？这还有说它的必要吗？

论：这个今昔不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辩：还不是因为解放呗。

论：解放了的是谁呢？

辩：就是你所说的那些穷棒子呗。

论：你明白这个，那就好办。穷棒子虽然解放了，可不敢忘了自己是穷棒子出身。现在穷棒子过年虽一年比一年好，可是得记住：是穷棒子才要解放，才能够一年比一年好；穷则变，变则通，不穷就不会变，不变就不能通。穷棒子出身的人，如果自己以为不是穷棒子了，只顾自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该干活的不干活，该多干活的少干活，干活的时候，有气无力，没个劲儿，那你就——

辩：我知道了，你是说瞎驴子拉磨，转回原处，象解放以前一样，还是穷棒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对吧。

论：可不就是这样！所以我得介绍你看个好故事，就是今晚《北京晚报》所登的这篇《煤矿工人的年》。你得象人家城子矿的李九德同志一样，十年全勤，劳动好，工作好，学习也好。这十年他可没白过，不但给国家多生产，而且也真正保持住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你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吗？

辩：这倒要请教请教。

论：没什么旁的窍门，他的老妈妈随时对他念叨念叨：“孩子，你别忘了本啦！”他的“本”，就是“穷棒子”。